

改革开放30年

► 广东农村村落变迁

案例研究丛书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特别委托项目



乡村的终结

——南景村60年变迁历程

陈那波 龙海涵 王晓茵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的终结: 南景村 60 年变迁历程/陈那波, 龙海涵, 王晓茵
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4

(改革开放 30 年广东农村村落变迁案例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652 - 3

I. ①乡… II. ①陈…②龙…③王… III. ①乡村-社会主义
建设-概况-广州市 IV. ①D619. 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6702 号

乡村的终结——南景村 60 年变迁历程

陈那波 龙海涵 王晓茵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曾玉寒 黎捷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经销: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www.gdpgfx.com)

印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6652 - 3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1 字数: 242 千字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图热线: 020 -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9667808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林 雄 郑德涛

副 主 任 蒋 斌 梁庆寅 田 丰 黄尚立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晋清 王建新 刘志伟 杜新山

李仲飞 李夏铭 何高潮 邹卫东

金炳亮 周大鸣 郑 毅 麻国庆

蔡 禾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一、“乡村的终结”：欧洲经验和中国实践 / 2

（一）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及其功效 / 4

（二）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活变迁 / 8

（三）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变迁 / 19

二、研究方法上的说明 / 24

（一）南景村的案例价值 / 24

（二）对农村的研究方法论争及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特征 / 25

三、余下的章节概述 / 27

第二章 走进南景村——当前南景村的基本状况 / 29

一、南景村概况 / 29

二、南景村的外貌 / 31

（一）街 / 32

（二）店 / 37

（三）楼 / 43

（四）车 / 44

三、小结与讨论 / 47



第三章 南景村的经济变迁及其分配 / 48

一、南景村的经济变迁 / 48

- (一) 土地改革前南景村经济状况 / 48
- (二) 土地改革后南景村经济状况 / 55
- (三) 改革开放初期南景村的经济变化 / 56

二、股份合作制的形成和结构 / 62

- (一) 集体经济与外来投资合力下的经济发展：
南景村股份合作制的形成 / 62

三、南景村的农民所得与分层 / 77

- (一) 股份合作经济中的南景农民所得 / 77
- (二) 南景村的社会分层 / 86

四、小结与讨论 / 86

第四章 南景村的政治变迁 / 88

一、国家权力之外的南景村 / 88

- (一) 正式权力制度：保甲制度 / 88
- (二) 非正式制度 / 91

二、国家权力的进入 / 100

三、改革开放后的南景村政治生活 / 104

- (一) 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 / 105
- (二) 南景村的管治 / 117

四、小结与讨论 / 131

第五章 南景村的社会生活变迁 / 132

一、南景村传统社会中的人口、家庭和宗族 / 132

- (一) 人口、家庭和宗族的结构与制度 / 132
- (二) 节日和祭祀 / 137
- (三) 生活方式和娱乐 / 139

二、社会生活的突变——土改时南景村的社会生活 / 140



- (一) 娱乐活动 / 141
- (二) 文化教育 / 142
- 三、改革开放后南景村的社会生活 / 145
 - (一) 人口和家庭的变化 / 145
 - (二) 生活方式的变化 / 148
 - (三) 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消解 / 153
 - (四) 寻找传统 / 167
- 四、小结与讨论 / 170

第六章 外来人口与本地社区 / 171

- 一、外来人口的生活素描 / 171
 - (一) 工厂打工者 / 172
 - (二) 外来经营者 / 184
 - (三) 外来人生存状态的制度逻辑及影响 / 194
- 二、小结与讨论 / 201

第七章 南景村的村改居过程与变化 / 203

- 一、治理难题和改制动因 / 203
- 二、南景村改造的难点和对策 / 206
- 三、南景村改制的实质变化 / 209
- 四、村改居后南景村的管治 / 213
- 五、小结与讨论 / 215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南景村及其社会科学意义 / 217

- 一、南景村变迁和有关的理论争辩 / 217
 - (一) 理性还是道义 / 218
 - (二) 产权与效率 / 220
 - (三) 谁得到更多 / 221
- 二、农村和农民如何转型 / 225



- (一) 南景村的经济变迁及其启示 / 225
- (二) 南景村的政治变迁及其启示 / 226
- (三) 南景村社会生活变迁及其启示 / 228

附 录 / 230

- 附录 1 部分访谈大纲 / 230
- 附录 2 被访者列表 / 238
- 附录 3 广州市××区××镇 AN 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 / 240
- 附录 4 广州市海珠区××街××第×经济合作社章程 / 248
- 附录 5 2007 年 AN 经济联合社工作总结及 2008 年工作计划 / 258

参考文献 / 263

后 记 / 276

第一章 导论^①

“终结”这个表述来源于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在2004年，该书的中文版译者李培林先生出版了题为《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②，以广州市的城中村变迁为对象，分专题探讨正在变迁的农村所反映出来的各类问题。本文以“乡村的终结”为名，一是考虑到学术上的传承，二是来源于本研究所选择的个案——南景村的特点，该个案同属广州市城中村的一员，可以说是已经“终结”或“消失”的农村。首先，在物理外貌上，农田已经消失，楼房密集，商店林立，尽管并不成规模；其次，在政治体系上，该村已经实行了“农”改“居”，村不再是一个行政单位，而只是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再次，在经济系统上，农业占比几乎为零，以租赁业为主的经济占据了农村经济的绝对比重。因此，以这个已经“终结”或曰正在“终结”中的农村案例，本文可以探讨农村或农民在转变过程中和转变门槛上所经历的事情及其影响。

这个案例的重要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终结”意义，更在于它是一个跟踪研究个案。早在1950年，杨庆堃先生的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就以该村作为调研的对象，描述了“土改”前后该村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成为描述农村变迁的重

① 本章由陈那波独立完成。

②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要文献^①。不仅如此，他还指导其学生围绕不同的主题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②。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人类学专业复办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师生对南景村进行了相应的跟踪调研，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③。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较为珍贵的跟踪研究个案，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基础。本文以上述研究作为基础，结合作者对该村当前状况的民族志研究，去联结南景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外貌、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变迁历程，并试图揭示由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科学价值。

一、“乡村的终结”：欧洲经验和中国实践

尽管以“乡村的终结”为题，本研究的核心仍然是中国的农民、农村社会的变迁问题：农村社会如何变迁？变迁的路径在实然和应然上通往何处？身处其中的人——农民——的变迁状况如何？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在仍然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农民群体的巨大变化如何推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整体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上述这些问题在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期间就已经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社会科学经典理论的主要部分。

① Yang, C. K. 1959.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Technology Pre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这一系列论文包括钱楚文的《南景村娱乐活动的研究》，正宝杰的《南景村家族与祭祀调查》，刘耀荃的《南景村的权力结构》。

③ 这些作品均为中山大学的本科、硕士或博士论文，包括：黄明的《鹭江村劳动力结构及其变迁——一个近郊农村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92年本科毕业论文；郝令晰的《鹭江村的农民家庭构成和家庭消费——一个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的变迁》，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85年本科毕业论文；任高玉的《近郊农村的城市化——广州市海珠区鹭江村城市化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85年本科毕业论文；路学仁的《鹭江村社会分化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91年本科毕业论文；郑德本的《城郊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86年本科毕业论文；杨英铂的《鹭江村组织的变迁——一个城郊农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92年本科毕业论文；高崇的《南景村亲属结构的变迁》，中山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孙庆忠的《都市村庄：广州南景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中山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等等。



1966年,巴林顿·摩尔在他的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国家农民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决定了他们走上民主还是专制的道路。^①这里背后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农民及农村社会必须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而改变;第二,农民和农村社会的转变方式和程度有差异,而这些差异对所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政治安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国的当前,我们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第一个问题。

农村变迁似乎有先例可循,欧洲农村社会转变的基本模式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张吸引或强行“掳掠”原有的农村劳动力,一方面为工业化扩张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实现农业资源集中化,形成更有效率的农业经营。当然,这个过程并非纯粹的。例如,许多国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伴随着的是殖民化,相当大程度上化解了农村人口外流所带来的压力。其转变的代价极其巨大,这些代价包括了宗主国农民和殖民地原住民的生命。其结果也并非单一。例如,真正能够有条件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国家屈指可数,包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均为殖民者开疆拓土而形成。而欧洲其他发达国家虽然市场化了几百年,却都没有实现美国式教科书中才有的“农业规模经营”。例如,欧洲的农业还是以小农场为主,三分之二的经营者是兼业化的;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迄今依旧是小农经济。^②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变迁,同样也是各行各法。印度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自由流转,付出的代价是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菲律宾同样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并带来类似的负面后果,而且必须通过大量的劳动力输出来消化劳动力过剩。相对而言,中国的农村转变任务最为艰巨,一是人口基数庞大,二是人均耕地面积数量也相当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农村没有走上土地私有化的

^①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② 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理论导报》2009年第2期,第5页。



道路，而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事件^①来实行中国式的渐变。这些转变历程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素材去讨论农民、农村社会转变的得失及其将来的道路。因此，本文将会首先回顾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变迁^②路径。

（一）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及其功效

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经济变迁，大体有下述三个途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商品化。

第一个途径是农村工业化。对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关注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农村研究的一个重点。当时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农村手工业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有研究者将当时的农村工业划分为家庭工业和作坊工业，认识到家庭工业和现代化大工业之间的距离，提出中国工业化应该走集中和分散结合的道路，民族工业应尽可能集中在大城市，而涉及提供人民生活用品的工业应尽可能地分散在各地乡村。^③ 费孝通、张之毅等对江村、易村的调查则体现了同样的观点，费孝通对江村的调研也集中讨论了如何将乡村工业和科学的生产技术与组织合作原则结合起来，而上述二者都同意尽可能地将可以不集中的工业分散到农村，这样更有利于资源的平等分配^④。这个观点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社会学恢复之后得到持续，这也是费孝通等学者继续倡导的“富民之道”的其中一个理念。部分地，这也是中国农村乡镇工业化的其中一个指导思想。这个观点也体现在实践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农产品的产出大幅增加，农民生活得到普遍提高，农产品的富足逐渐带来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标志性现象是个体户数目的迅速膨胀，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在地方区域内售卖农产品或轻工产品。其后，全国上下的许多农

① 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化农业——家庭联产承包——乡村工业化等等。

② 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土地私有化之后，农民群体随后解体，原农村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转变的任务也相对较轻。而在中国，农民群体的总体及其聚居的方式并无重大变化，其政治和社会转变与经济转变一样，是艰巨的任务。

③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

④ 张之毅：《易村手工业》，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



村进入工业化阶段,标志现象是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纷纷上马。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和费先生最初的想法吻合的。但是这种分散化的农村工业在一段时间后遭到质疑,主要是分散的农村工业无法实现规模效益,浪费比较严重,环境生态的代价相当高。相当多的这些乡镇企业也没有坚持下来,最终以关门结业收场。所以,总体来看,如果说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实际所经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恢复家庭生产和农产品产出的大幅提高)——小商品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地方区域内售卖农产品或轻工业产品)——乡镇工业化的阶段(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的大量外来资金的涌入和本地资金的重新活跃)^①,那么,这个历程在最后一个阶段开始凸显出区域差异性,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区域中的乡镇工业逐渐转型,实现了规模化或集群化^②。而在中西部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内,在农村工业化大潮中所产生的乡镇工商企业在竞争中失去力量,并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事实上,改革开放后农村工业和经济方面的实践和变化迅速地超越了研究者的设想,产生了巨大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更后期的研究者意识到这种多元性和差异性,有研究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进行概括,包括温州模式^③、苏南模式^④和珠江模式^⑤等等,一

① Chen, Nabo. 2006. *Market penetration and life chances in a transform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rural Guangdong, China, 1978 - 2004*,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② 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乡镇工业以产业集群的方式聚居,如南海的铝材业、中山的家具业、开平的水暖设备业等等。

③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所谓的“小商品,大市场”,即经济形式家庭化、经营专业化、专业产品系列化、市场要素市场化、服务环节社会化,参见施福德:《“温州模式”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4期,第62页;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④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集体的村社企业在动乱时期得以保留,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分割,在改革开放后,这些村社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当地城镇工业化的主导力量。参见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⑤ 珠江模式是指以珠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外向加工产业带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参见杨雅彬:《老一辈社会学家视野中的中国农村工业》,《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65-74页。



些研究深入分析这些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可见，就目前来说，研究者的关键任务是总结这些发展的不同模式，分析这些不同模式背后的制度特征及其和发展模式之间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可推广性。

超越这些模式去探究其背后的制度因素，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外来投资作为重要的变量所带来的影响。用费孝通先生的话，一开始是内发的模式，后期则是以珠江模式为代表的外联模式的扩张，并取得绝对主流的地位。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乡镇工业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和他们的区域在吸引外来投资上的便利性密不可分。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距离的影响，距离区域市场中心越近的农村越有可能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农村精英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许多地理位置偏远的农村也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发展，多数对这类农村的案例研究均表明农村精英在组织本村生产、引进技术和联结外在的大市场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①

第二个途径是农村城市化。城市化对经济的促进同样是明显的，在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集结、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的提供等方面均能带动所在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浪潮的早期形态是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和乡村工业化相结合而产生的。在学术界，小城镇建设自1983年费孝通先生的《谈小城镇建设》一文在《社会学通讯》第2期发表后成为当时关注的热点^②。但是，伴随着乡村工业化呈现出的区域性差异，小城镇建设热潮也随之冷却，而大中城市的城市化浪潮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取代了小城镇建设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角。在大中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许多城市周边的地区被城市所吞并或包围，原本的农民主动地或被动地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的扩张也为他们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当然，这两条道路也可以并行不悖，一方面区域的中心城市不断扩张，周边的小城镇也在不断城市化，从而最终形成联结，形成城市群。目前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基本

① 费孝通：《谈小城镇建设》，《社会学通讯》1983年第2期。

② 费孝通：《谈小城镇建设》，《社会学通讯》1983年第2期。



形成了这样的联结。

第三个途径是农业商品化。中国的农业商品化包括了以下几个特点：农民仍然居住在原地，确定适合自身发展和外在市场需要的产品，提高农业方面的产出，将自身的农业生产和本地市场或外面的大市场联系起来，获得充分的收益，改善自己的生活。较早提及农业商品化模式的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公司+农户”的方式和以专业户、专业村所组成的“一村一品”为形式的庭院经济^①。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实行，农产品的产出数量不断提升，产生了农业商品化的可能，针对当地市场的农产品销售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某些地区，形成了商品化农业经营的发展模式，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及的河南民权县。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农业商品化却并没有最后发展扩大，同时形成了区域差异。在许多的山区或内地偏远农村，农业商品化和劳务输出成为当地农民为数不多的选择^②。但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往往缺乏组织化，无法在市场中获得有效的谈判地位，因此，农业商品化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很多前提条件：地方的商业传统，地方政府或地方的政治和经济精英能否起到有效的组织和推进作用，农村和外部市场的距离（考虑到交通条件的到达时间）等。因此，真正能够在农业商品化方面取得成功的往往是一些郊区农村，或者是地方政治经济精英能有效地组织地方力量的区域。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农业的集约化和商品化程度，由此引发了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方式上的争论。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奉行者，其内在逻辑是：实现土地私有，生产资料就会经过优化配置进行集中，从而提升农业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资料得到有效的利用，其效益提升，也即所谓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逻

① 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② 当然，另外一个选择是输出农村劳动力，但这种方式难以较迅速地带来当地的发展。



辑。另一群体更多是深入到农村进行经验研究、深谙农村状况的研究者，包括温铁军、黄平等。他们更多地强调实现农村土地私有化对农户和对国家所带来的压力，认为应该向日本和中国台湾学习，学习他们农村社区建设加小农生产结合的模式。

上述的三个方面可以汇总成下述的问题：首先，在经济转变的途径中，有的农村可以选择工业化外加外来投资的方式实现经济转变，靠近城市的农村可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得到转变，而在一些地方精英和政治精英能起有效的组织作用的区域，农业商品化同样能够提供客观的经济收益。在这些途径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外来投资的作用，与城市距离的作用，以及地方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作用，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农村的经济转变？要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针对不同类型个案的经验研究。而南景村的研究正是其中之一。

（二）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活变迁

政治社会学对于政治变迁的经典研究可见于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莫斯卡和帕累托。他们各自都发展出一些关键性的概念来解释政治变迁。在斯宾塞的研究基础上，迪尔凯姆将结构分化作为现代和工业社会出现的重要过程，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分化理论的中心问题，即一个由分立的各个个体组成的社会是如何凝聚的。对此，他的答案是一个被认可并广泛化的集体良知。在马克思和韦伯的研究中，分化概念不像在迪尔凯姆那儿那样处于中心位置。相反，另外一些过程，例如马克思的商品化（或阶级斗争）和韦伯的理性化（或科层化）则显得更为基本。对于马克思来说，理解任何社会的关键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构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会引发阶级冲突的产生，阶级冲突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相对其他的经典作家而言，韦伯指出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行动的形式理性化不断增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他直接回应马克思的研究，认为地位群体、政党和阶级斗争一起形成了政治。而对于莫斯卡和帕累托来讲，精英才是理解政治



的关键所在，任何的政治社区都无可避免地分裂为两个群体，一是存在于社会的数量巨大的无组织的大众，二是掌握权力的人数较少的有组织的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的核心^①。所有的这些理论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许多的研究角度，例如阶级角度（马克思的角度），现代化角度（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角度），制度角度（韦伯的角度）和精英主义角度（莫斯卡和帕累托）都被应用到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学术界的分析工具主要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一方面，许多中国学者试图将中国农村政治解释成为阶级关系的一个反映。根据这些观点，农民的困境和痛苦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剩余价值”的剥削造成的，这种剥削是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利息来实现的。因此，农民对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绅—官僚阶层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作为该理论的一种反映，对地主阶级通过土地革命进行了改造，土地被划配给了农民使用。另一个方面，这种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这种生产方式被认为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立，必须加以改变。这是后来的集体化、“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建立的主要理论轴心。

韦伯的理论在中国农村政治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对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对复杂社会系统的比较研究的一个极具启发性作品，是产生对中国社会和它的社会经济发

① Giddens, Anthony. 1971.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Held, David. 1983. "Central Perspectives on the Modern State." in *Sates and Societies*, edited by J. A. David Held, Bram Gieben, Stuart Hall, Laurence Harris, Paul Lewis, Noel Parker, Ben Turok. Martin Robertson: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Held, David. 1984. "Beyond Liberalism and Marxism." in *The Idea of Modern State*, edited by D. H. a. S. H. Gregor McLenna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isty press; Wank, David L. 1998.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Contemporary China: State - Society Images in American China Stud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205 - 227; Waters, Malcolm. 1994.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Sage.



展模式研究的有意义观点的源泉”^①。在他的研究中，他力图以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政治，这些制度包括“保甲”、“地保”、“庙会”等。韦伯的作品带来了许多关注现实的制度安排的后续研究。

具体而言，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下述的几个主要阶段：

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模式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中国研究的“潜存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美国的发展模式被看成是中国的未来。美国的政治系统，如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定期选举、三权分立、市场经济、对公民社会的重视等一系列因素统统成为一种参照系，用以观视 1949 年后的新中国，以求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寻求后者的趋同之路。“国家与社会”范式聚焦 1949 年之后的新中国，并预设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这对立的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和斗争则成为该范式的主要内容。首先，它强调党的绝对权力并认为国家拥有对社会无可挑战的优势地位。其次，社会上的大众被认为是原子化的，并依赖于精英的权力和他们对资源的分配。在他们的研究中，农民被认为是被动的、没文化的和迷信的。因此，有相当数量的对农村政治的研究着重去表现国家是如何打破传统的农村社会并重建一个在党—国家领导框架之内的新替代品。例如，在舒尔曼的分析中，为期一个世纪的革命过程摧毁了中国人社会行动中的三个传统的特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以绅士阶层作为统治阶层的社会系统、以家庭为前进动力的人格系统。舒尔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系统。他认为，绅士权力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已经失去。新的组织（包括党组织、集体农业和中央调控的经济形态和沟通体系）和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结构。在这个结构

^① Yang, C. K. 1968. "Introduction." p. xiii in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New York,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